

金融與經濟群言堂

—— 陈观烈教授从教经济学五十年纪念文集

戴国强 杨 力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金融與經濟群言堂

——陈观烈教授从教经济学五十年纪念文集

A Symposium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Chen Guanlie for

His 50 Years of Economic Education

戴国强 杨 力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金融与经济群言堂

JINRONG YU JINGJI QUNYANTANG

戴国强 杨 力 主编

特约编辑 李超民

责任编辑 张小忠

封面设计 周卫民

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发行	上海印刷七厂一分厂	
印刷	上海印刷七厂一分厂	
装订	上海印刷七厂一分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4
字数	406 千	
版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书号	ISBN 7-81049-277-2/F·226	
定价	35.00 元	

编者的话

半个世纪前,陈观烈先生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从大洋彼岸学成归来。1948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至今整整50年。陈老作为我国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在50年的教学生涯中,以他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崇高师德,为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老执教复旦(后兼职上海财大)以来,是公认的严师和良师,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陈老在哈佛求学时,在货币银行学方面已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可是在教学中他宁可自己少写几篇文章,也要备好每一堂讲课。虽然他曾长期受到不公待遇,不能用其所长,但在被迫改行教工业经济后,依然取得斐然教学成就。改革开放以后,他始得重操旧业,从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追踪和把握当今世界上日新月异的金融理论发展动态,搜集有关资料,潜心研究,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而又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精彩讲授,把学生引进了金融科学的殿堂,所以凡听过陈老讲课的人,无不认为这是一种享受,惊叹先生对货币银行理论的把握深刻而又精当。在著述方面,他所发表的每一篇学术论文,都有着精湛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古人云,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陈老对学生要求既是严格的,又是关怀的,要求他们博学、慎思,提倡百家争鸣,特别对研究生,总是要求做到“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凡学生有所提问,他即使在百忙中也要挤出时间和学生细细讨论,甚至生病住院,在病

房里还批改学生作业,传道、授业、解惑而不知疲倦。正是在陈老的谆谆教导下,我们懂得了“学,然后知不足”和“行成于思,毁于随”。

人师难得,良师更难求,本书各文作者,或是聆听过陈老授课,或是在陈老指导下获硕士、博士学位,都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如今陈老“桃李满天下”。在庆祝他执教 50 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谨撰文结集,出版这本学术论文集,无非是向老师汇报,既表敬献,也借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陈老教育的成果。陈老经常要求我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自忖这些文章未必能够符合先生的愿望,有不少观点尚待商榷,但每人确实都力求做到“推陈出新,饶有别致”。

谨以此书献给陈观烈教授,以表我们的敬意和祝贺。感谢汪道涵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南方证券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杨家铎先生对本书出版的热情支持;对陈老哲嗣允恺博士的支持(见附信)也表示感谢。

在此,还要感谢上海财大出版社的同志及上海财大金融学院的研究生们,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此书不可能这么快问世。

编者

1998 年 12 月

附：

陈允恺博士来信

主编先生：

得悉你们正在向家父陈观烈先生的贤弟子们征集文稿，以汇编出版，作为对家父在大学从教 50 周年和 80 岁华诞的一份献礼，我对此感到无比高兴，并生发感激之情。

父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便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毅然从美国归去，1948 年受聘为复旦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满怀希望和热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学术研究工作。虽然，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历经政治风雨，有相当长一段时期不能用其所专，甚至受到某些不公正待遇，但他无怨无悔，始终兢兢业业，致力于领导上分派的任务。“文革”结束后，他才回到所熟悉的货币银行学本行，但此时已年届花甲，为了补回已被耽误的时光和急追世界水平，他加倍努力学习。20 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不论是开会、讲学、研究、探亲，他都无意于采购时新洋货，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搜集货币金融的参考资料，而且要求在美子女为他购书、借书和复印。我自己也在为父亲效劳的过程中，渐渐萌发了对经济学的兴趣，因此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主修虽是数学，辅修却是经济学，还获得过一个经济学硕士的学位。

这几年来，我曾同几位经济学界的朋友合写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文章，现检寄尚未公开发表的两篇，希望以此参加你们对家父的祝贺。我虽然不是父亲的正式学生，但父子之情谅能得到你们的理解，拙文倘得收录在所编文集里，我将感到极大欣慰与荣幸。

此致

敬礼！

陈允恺

1998 年 10 月 26 日于美国北卡罗来那州

作者名录(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 陈建樑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陈伟恕 教授,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
- 陈允恺 数学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教授
- Ping-Chu Chu 经济学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副教授
- 戴国强 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杜巨澜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 甘当善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 哈继铭 经济学博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
- 胡庆康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主任,教授
- 黄亚钧 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姜波克 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孔刘柳 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 刘 波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国南方证券公司董事、总裁
- 刘红忠 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主任,副教授
- 李 军 经济学博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梁伟坚 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 骆玉鼎 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 柳永明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 钱海章 经济学博士,国信证券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 A. J. Roayaei 经济学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副教授

-
- B. J. Seldon 经济学博士,美国达拉斯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
- Anne Sibert 经济学博士,英国伯克贝克学院经济系,伦敦大学及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
- 舒 元 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史正富 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 童适平 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 王林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文贯中 经济学博士,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亚太所访问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 王新奎 经济学博士,上海外贸学院院长,教授
- 王 战 教授,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 韦 超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 徐晓青 经济学博士,现在美国从事经济金融咨询业务
- 薛万祥 经济学博士,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 杨 力 经济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经贸管理学院
- 朱 菁 经济学博士,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副总监
- 朱立刚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顾问
- 朱 民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中西毕贯 名世高才*

——陈观烈教授访谈录

薛万祥

陈观烈,男,汉族,1920年12月生于广东潮阳县。1942年中央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1947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任职于南京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1948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先后兼任该校银行专修科主任、世界经济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经济学院院长。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货币银行学博士生导师。曾受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研究员(1984)和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89),现仍兼任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宁波大学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顾问。独著有《资本主义货币银行概论》(《世界经济文汇》杂志系列讲座,1991)和《积极的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载《我的经济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另有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与人合著有《世界经济概论》(人民出版社,1983)、《当代西方经济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和《西方银行业务与经营》(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记者

□陈观烈教授

走进陈观烈教授书房,映入眼帘的是一红色的条幅,上书“诲人不倦,精益求精”八个大字,那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师生在1989年冬祝贺陈教授70华诞和执教43周年时赠他的,它恰好为我们的这次采访提供了一个“引头”。

* 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博导》,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教书有三“乐”

□我是自愿选择教师这一职业的，教过小学、中学，呆在复旦大学也已经快 50 年了。“好为人师”这本是一句贬语，但从选择职业的意义上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教师有很多乐趣。第一，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为一乐，我也有同感。当我看到一批批的学生在自己的引导下，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时，就会感到自己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心理上得到许多的安慰。其次，《礼记》云“教学相长”，这也是为师之一乐。我自己就有过这样一个难忘的经历。记得很多年前，我在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时候，曾经说过，货币的存在，可以使众多的商品比价，比在物物交换时所必须有的宏大数字大为减少。课后，有一个学生（朱民）向我提出，这种说法是马克思所批评的“惯于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中所遇到的外部困难去寻求货币的起源”。我立即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在第二次课上作了公开的纠正，以后更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鉴别西方教科书中似是而非的东西。最后，我认为，教书比其他工作还多一种乐趣，那就是，它相对来说有较大的言论和学术思想自由。所有这种种乐趣，又是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的，可以说在带博士阶段，收获是最大的。这就是我至今乐此不疲的原因。

按照经济学的原则，良好教学效果的一个标准是，教师能帮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系统的新知识。我也当过学生，当时所钦佩的正是那些言而有物、逻辑严谨、富有启发力的老师。因此，在我做了教师以后，就以此为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我把教学工作放在生活的首位，把大部分可支配的时间用来备课。甚至在入睡后也有过兴高采烈讲课的好梦，有过在讲台上憋着说不出话的恶梦。在备课中，我最注意的是：基本概念表述清楚，学界分歧抓到关键，内容层次分明，语言深入浅出。另外，还要给学生开列深浅有

序的参考资料和提示必须细想的问题。当然学问是无止境的,备课也永无到头的时候,所以讲稿就得年年重写,而写的都是自己的体会,一写上纸就印入脑中,到上课时你们就看到我不用讲稿而口若悬河。这不过是把装进肚里的水倒出来罢了。我常常说教师的真正脑力劳动是读书和备课,到上讲台时,基本上只是体力劳动了。当然,一言堂和满堂灌不是好的教学方法,所以我认为备课和讲课的内容都应该是拣重点,次要的或比较容易懂的问题应让学生自己去看书或提问题,让他去找参考书和思考,这样在课堂上就不必花很多时间。为此,我还要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对本科生,一般一学期至少一次;对研究生,那就更多了;对博士生,是在开学时共同商定一批专门题目,由我指定参考书,然后师生各选若干题,分头准备,轮流主讲和讨论,最后由我总结和评定。教学相长的好处在这种讨论中最为突出。

作为教师,对学生若无严格要求,那就不算尽了责任。严格要求学生好好听课,读指定的参考书,在考卷上不单是背书,还要汇报他听讲和自学的心得,另外还要不厌其烦地修改他们的论文。这种种的严格要求可以让学生在本学科的学习中有更多的投入,从而得到更多收益,可以养成学生艰苦创业的品质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可以使学生对教师有更多的质疑和反馈,是对教师的一种促进。《三字经》说“教不严,师之惰”。我不愿做懒惰的教师,所以在我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严格要求你们了。但对不同的学生,我的要求和期望是不同的。比如对本科生,我要求他们“练好基本功,立志攀高峰,千仞足下始,步步不放松”,对硕士生则要求“甘坐冷板凳,莫恋名利场,由博而集约,切戒徒空谈”,对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标准是:“继往又开来,新花巧手栽,深入还浅出,实践作定裁”。

但是“人只能把马牵到河边,而不能逼马饮水”。严格要求是我的愿望,也确有很多学生不负所望,举一反三,很令我高兴;但也有

少数学生不能完全做到或完全没有做到,对此,我除了“看表现,给成绩”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修学哈佛,心挂货币银行

○先生,听说您在复旦原是教工业经济的,而且颇受欢迎,您为何后来又转到货币银行的教学与研究上来呢?

□我不是改行搞货币银行学的,而是重操旧业。早在大学读本科时(1938—1942),我就对货币银行学感兴趣了。当时社会上对西方国家30年代的大危机记忆犹新,国内又面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恰在这时,我就读的中央大学经济系聘来了几位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比如讲货币银行学的褚葆一教授,讲授财政学的宁嘉风教授,还有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请来兼课讲“货币理论”的李卓敏教授。他们传授了有关经济波动和货币稳定的西方新学说,对我很有吸引力。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虽然不多,但凯恩斯的《通论》和罗勃逊的《货币学》都已经有了,我经常晚饭后到图书馆去排队,抢在别人前面借阅这一类书籍,所以到我将近毕业时,我对庇古、罗勃逊、霍特里、凯恩斯和海耶克等人的理论多少都有些了解了,也初步认识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储的运作情况以及罗斯福的“新政”。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参加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和出国留学考试时,都报考财政金融类,并都以高分被录取。后来我就到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学习。哈佛的经济学科在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当时她拥有一批世界驰名的大师,他们在理论上各有一套,有的还有过丰富的实践经验。哈佛大学有关金融和经济周期的几门重头课,都是由好几位名家轮流担任主讲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我对这些课程都是多方面求知,往往在正式选修一个教授的课之后,又旁听了另一教授的同一门课,兼收并蓄,试作比较,然后各取其长。例如当时讲授货币银行的有兼任纽约联储副總裁的威廉斯(John Williams)教授,他主要讲金本位制的得失和评

论当时刚拟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章程。后来这门课由兼任美联储顾问的汉森(Alvin Hansen)教授来开,他就着重阐明凯恩斯的理论和所谓功能性金融(Functional Finance)。经济循环这门课先是由世界著名的熊彼特教授主讲,他既阐明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他显然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比银行信用更重要。后来由《繁荣与萧条》一书作者哈伯勒教授来讲这门课时,他就认为经济波动有实际因素和货币因素,而货币因素常常被低估了,应该对后者加以更多的肯定。这些大学者每门课的头一堂课是要散发参考书目的,我总要挤上去领一份,然后就充分利用哈佛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藏照单阅读,这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培养了我的识别能力。从此下定决心,回国后专门研究货币银行。此愿望在1948年秋天实现了。当时复旦大学经济系聘我为教授,要我同时开三门课,我开出的就是货币银行、经济循环和商情预测,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货币银行学上。

在复旦教书还不满一年,上海就解放了,我有必要、也有条件读马列的书。读了这些书后,自以为有可能、有办法把马克思主义货币信用理论同西方金融理论结合起来,形成适合于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货币银行理论。在1950年我还为复旦筹办了一个银行专修科。但不久,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开始了。从此,我国在宏观管理上,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货币真正成为了“面纱”,银行成了财政的出纳。而与此相对应,全国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系的课程设置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大压缩有关流通领域里的课程,货币银行学后来便从课程表上消失。于是我就不能再教货币银行学,而被调去教工业经济了,同货币银行学一别就是29年。当然,在那段时期里也有用上我那点金融知识的时候。例如在文革中到处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时,许多同志不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银行的新老作用、金融资本、股票掺水等金融知识,领导就派我到工厂、到干校“同学习”或作辅导。当我讲起那差点没有被忘记的金融知识时,居

然也能使人听得津津有味。

80年代初,我终于有机会辞掉了工业经济的教学任务,再操货币银行学的教研旧业(虽然在经过14年的摸索后,我对工业经济也有了一些了解,还出版过一本讲义,若是继续教下去,也还能驾轻就熟,但总没有当年对货币银行学的热情)。不过这旧业荒疏的时间太长了,记忆力减退了,藏书散失不少,与国内金融业和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也中断了,对三十多年里国外金融学术的进展毫无所知。因而这“再作冯妇”是很吃力的,但是我无怨无悔。到老圆了青年时代的梦,即使只及其十分之一,也算是幸事了。

中西毕贯,名世高才

○听了您刚才的一番介绍,我更加敬仰您对西方货币银行学的不懈探求和深湛素养。但据我所知,您近几年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我国金融问题和金融市场建设的论著,如《积极的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建设我国规范的社会主义金融市场》、《把利率这个宏观调控手段用活起来》、《有序地进行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等,很受我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重视,有的还获得了大奖。这大概就是现在墙上的这副由著名书法家王蘧常教授书赠给您的对联中所说的“中西毕贯,名世高才”吧。能不能请您就“洋为中用”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瑗老(蘧常先生字瑗仲)在这副对联中所写的是对我的勉励,不是对我的评价,我远未做到“学贯中西”,更不用说“毕贯”了。有时我真觉得毛主席所讲的“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就是指我这种人而言的,但我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也经常要求学生要做到“洋为中用”。既然要做到洋为中用,首先就必须知道洋人讲了些什么。其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然后针对中国的国情予以扬弃。在这个过程中,知彼知己是首先要做到的。我在80年代就金融学科所做的自我补课,主要是解决这“两知”。到了

90年代总算知了一些,才应邀提笔写了一些有关中国金融的文章,但总觉幼稚。我希望自己在余生中继续进步。更希望你们这些学生务必要在借鉴外国以建设中国的现代金融学科上,大大地超过我。

○那么,能不能请您就“重操旧业”以来,您在货币银行方面的新见解给读者作一些介绍呢?

□好,就让我试着说吧。

首先,我觉得要掌握货币金融理论,必须理解货币的社会性,货币的诞生本是为了体现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货币因此成了“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成了“社会抵押品”。谁拥有它谁就拥有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这就是货币的社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所体现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更广泛、更复杂了。它还包括了借方与贷方的关系、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代人与下代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货币的社会性及其丰富的内涵,是正确理解货币的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关键,也是制度因素之所以能影响经济为主体取舍货币(资产选择)的决定,从而使宏观货币经济运动有所变化的重要依据。西方学者惯于以物性、人性、技术性去说明货币的本质属性,这就是他们至今还说不清楚“货币是什么”,“货币是否有用”和“货币怎样被人们利用”的根本原因。

○关于这一点能不能请您简单地举几个例子?

□可以。就举三例吧。

例子之一就是黄金的非货币化。30年代大危机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用黄金充当货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信用货币。黄金的非货币化不是由于黄金的物质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信用的发展,人们已可以在一定制度(包括纸币发行制度、存款变现制度和债务清偿制度)的保证下,使货币的社会性不再是由黄金而改由信用工具来

加以体现了。在国内外都有人认为只有黄金才是真正的货币,黄金总有“再货币化”之一日,其错误根源是只看到了黄金的物性而忽视货币的社会性或者把二者混而为一。

例子之二是货币供给与需求由什么力量来决定。决定真实货币供给的,不仅有政府或中央银行一方,还有公众一方;反过来,公众的货币需求,也不仅仅取决于公众一方的意愿,也受到政府的金融政策的影响。所以在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中都有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供求两者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这就是货币社会性的体现,货币的供给和需求是社会上多种力量共同决定的结果。

例子之三是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货币是否有(增产)作用”的问题。说货币“有用”的,是认为政府或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公众的“货币幻觉”增加货币供应以刺激生产;说货币“无用”的,认为公众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而有适应性(甚至是理性)的预期,从而以物价与工资的及时调整来使增产政策失效。不管是哪一方说得对,都表明他们默认货币的社会性。

○刚才您提到的第二个例子,货币的供应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那么如何看待中央银行在其中的特殊地位呢?

□虽然货币的供应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但是中央银行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和监管金融市场的执行机构,它既可以主动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也可以主动通过准备金比例和利率的变化手段来影响货币乘数,从而改变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有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条件。它虽不是万能的,但在决定货币供求的各种社会力量中,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它不是有些人所比喻的“备用灭火器”。

○那么,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是相信货币在一定条件下有推动力的。当社会上存在闲置资源时,可以适当增加货币的供应,以增加积累,增加资源利用

的广度和深度,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许这时候有公众的货币幻觉可以利用,但这种利用不能说总是恶意的。不过如果这种推动力被用得过度了,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要使这种力量用得恰当,中央银行在调节货币供应时就应有双重目标,即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是对立统一的。它们是对立的,因为两者有所不同而且常相冲突;它们是统一的,因为增长可以通过更多的有效供给稳定物价,而物价稳定也有利于成本核算和计划安排,从而有利于增长。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最优的选择是两个目标同时达到,但是许多情况下只能是次优选择,即在两个目标各有得失情况下适当的配合。

进一步来说,在对立统一体中,总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而它们的主次地位是会转化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经济发展从长远来说是主要的,发展是硬道理嘛。但是当经济中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如1988年1993年,这时就应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目标。因此双重目标中以谁为主,应视经济状况而定。中央银行的运营艺术就要在这两个目标的适当配合上表现出来。

中央银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应在理论工作上,按照实际的情况,做好货币供求理论和货币传导机制的研究,建立相应的模型,测定不同的货币投入量如何通过某些途径对产量、就业、收入、价格、利率、国际收支等产生多大的影响,然后从比较中确定较优的货币供应量。国外在这方面有许多的模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但是还比较零散,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再有一个方面,中央银行要在实际操作中,灵活掌握货币政策的工具,对经济进行“微调”。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就当前我国情况来说,用活利率这一杠杆,是开拓国内资金来源、遏制投资过热、提高投资质量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的急切可行办法。

○陈老,您在前面说明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时,曾说可以容许